

领袖 和 谋士

(苏)费·布尔拉茨基著

徐锦栋等译

東方出版社



2 018 4142 7

领袖和谋士

关于赫鲁晓夫、
安德罗波夫和其他人……

〔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著

徐锦栋等译



东方出版社

Федор Бурлацкий

ВОЖДИ И СОВЕТНИКИ

О ХРУЩЕВЕ, АНДРОПОВЕ И НЕ ТОЛЬКО О НИХ.....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0

根据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译出

领袖和谋士

LINGXIU HE MOUSHI

关于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其他人.....

作者/[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

译者/徐锦栋等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4.25 字数/291,000

版次/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245-0/D·60 定价 6.00元

(内部发行)

译者：徐锦栋、方建华、黄志坤、董拴存、冯跃武

全书由徐锦栋审校

出版说明

本书是苏联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1990年出版的一本新作。作者长期充当苏联高级领导人的政治谋士，参与了相当多的政治活动，了解苏联50—60年代许多重大事件的内幕。作者是较早写有关赫鲁晓夫的人，在本书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论述了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变迁和重大历史事件，描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苏联领导人以及曾与他们接触过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的形象、性格、作风等。作者认为，本书是为这些领导人物塑造政治肖像，而更大程度上是心理肖像。

本书对于了解苏联的政治变迁，研究苏联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本书中，也反映出作者和苏联思想界关于鼓吹政治多元化、诋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观点，请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前 言

这本书的主要意图是试图塑造赫鲁晓夫及其周围的人（我观察了他们多年）的政治肖像，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心理肖像。为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准备讲话稿，有时充当谋士，使我有机会目睹政治生活的内幕。所以，促使我写这本书并非事件本身（它们早已多次被人写过），而是那些依靠机遇或灵活性、真理或谎言登上奥林庇斯圣山^①的人的脾性。

在将近5年中（从1960年到1964年），我同赫鲁晓夫接触密切，有机会听到他在非公开场合、会见国内外政治活动家时的谈话。我曾6次随他出国。

要说寻找类似的现象，那么我的活动与托德·索伦辛替约翰·肯尼迪所做的那些事情最为相似。在讨论加勒比海危机的国际会议和其他会晤中，我结识了索伦辛并同他交为朋友。使我们俩愉快和吃惊的是，大洋的双方都在做大致相同的工作。更奇怪的是，双方都有极为相似的感受。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有智慧和勇气防止热核战争的两个大国领袖的助手们当中，我和他大概是最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

赫鲁晓夫这个人本身就令人感兴趣。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

① 希腊神话中众神居住的地方。——译者

子，矿工，平平常常的钳工，只受过最低的教育（他至终没有学会书写不出现拼写错误），竟登上那样的权力顶峰。他受到斯大林的亲切对待，却成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勇敢和伟大的毁灭者。取得政权以后，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他掌握我们每个人、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命运。

在我们祖先的想象中，最后审判和启示的权利只属于上帝。但是历史偏偏喜爱离奇的现象，竟然把那样的权力交给这个来自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的普通俄罗斯庄稼汉。俄罗斯，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贫穷和不幸的、被蒙古人的桎梏、残忍的沙皇、而在我们的时代被斯大林主义折腾得遍体鳞伤的地方。

年青的读者很难明白，赫鲁晓夫的名字和赫鲁晓夫时期对于我们这一代苏联人，对于那些在非常可怕的世界大战和更为可怕的恐怖时期度过年青时代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妨想象一下，成千上万、千千万万的人拜倒在偶像脚下，突然有一个人说道：“请看一看，这只不过是一尊由你们自己塑造、你们自己竖在台座上的铜像。”这个人说话后，把一条金属绳圈扔过去，套在偶像的脖子上，在推土机和坦克的帮助下把偶像推倒。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东欧各国的首都，偶像都这样被推倒了。

被伊利亚·爱伦堡^①十分贴切地称为“解冻”时期的赫鲁晓夫时期也同样令人感兴趣。这是苏联乃至整个现代世界历史上最重要、或许最不寻常的时期之一。说它重要，是由于这

① 爱伦堡(1891—1967)，苏联俄罗斯作家。——译者

一时期同我国当前进行的改革和刚刚开始民主化直接互相呼应；说它不寻常，是因为前后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开始被称为“光荣的十年”，后来得到了“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盛行”的称呼。

那是一个尖锐政治斗争、改变人的命运的时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给予了毁灭性打击，但他的手似乎在威严庞大的斯大林体制面前停了下来。当时，从冷战向和平共处的过渡已经开始，通向现代世界的窗户重新被打开。但门户尚未开放，人民依旧同现代文明脱离。在那个历史急剧转折时期，我们社会大口大口地吸入革新的空气。不知是因为吸多了，还是由于缺氧，上气不接下气……

在苏联，很长很长时间内不让提起这些急风暴雨的年代，似乎有一只手把我国编年史的完整一章全部撕掉。20多年中，人们忌讳提起赫鲁晓夫的名字。然而，生活显示了它的力量。在我们时代，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过了差不多1/4世纪，我大概是第一个写有关赫鲁晓夫的人。从此以后，有关赫鲁晓夫的文章和回忆录大量涌现。

我的这部书（它并非纯粹的回忆录）也随之问世了。除了个人的观察之外，我在著述中还利用了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一些历史文献材料。在书中，我尽可能多地记叙赫鲁晓夫同其他苏联活动家和外国活动家——铁托和卡德尔、卡达尔和毛泽东、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间的关系。

我很早就对我们这个如此波澜壮阔、如此悲惨的现代世界的政治领袖问题感兴趣。我写过列宁和斯大林，写过毛泽东和邓小平，写过希特勒和佛朗哥，写过约翰·肯尼迪及其他活

动家。而赫鲁晓夫，他是我们这一代生活的一部分，是我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更应该写他……

有一个现象使我对赫鲁晓夫尤其感兴趣，我把这个现象称为专横的宗法制政治文化。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正是这种文化的最鲜明的表达者之一。

赫鲁晓夫的那些回忆录对于我来说尤其宝贵，它们是思考斯大林时期以后我国命运的源泉。这些回忆录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们使这个时期的人有巨大的勇气否定这个时期。其二是因为它们造就了具有敏锐政治头脑的人，这些人的见解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意义。这些回忆录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作者是一位一心渴求苏联和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富裕与和平的活动家。

再来看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的风格，关于这一点可以说出许多。与20世纪另一位大活动家温斯顿·邱吉尔的回忆录不同。邱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继续捍卫自己的正确性，同自己过去的敌手纠缠不休。而赫鲁晓夫却以真诚坦率、质朴和忏悔之情赢得了读者。总的看来，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直至临终前还想弄清和认识过去并把自己的认识告诉后代，没有任何的自我陶醉和卖弄，丝毫不夸大自己的个人作用，一点也不想把自己的罪过归咎他人。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专心致力于他所参与的事件、用老年人的智慧权衡自己生命的每一步的人。在赫鲁晓夫活动的后期，曾经如此妨碍他的自以为是的外壳已经脱落，斗争的激情已经熄灭，掌声的定音鼓已经不响了，余下的是一个普通俄罗斯农民的健全思维。他的回忆录是当之无愧的文献。遗憾的

是，它们至今没有在苏联全部发表！

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涉及我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和赫鲁晓夫的多方面的活动：党的二十大和准备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二十二大，杀害基洛夫和清除三分之二的十七大代表，迫害军事人员，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案件”，对芬兰战争，同希特勒签订条约，华沙起义，朝鲜战争，斯大林之死，逮捕贝利亚，柏林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回忆各国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家，同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会面。总之，涉及 3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亦即 30 年时间中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历史学家们还将对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所叙述的事件写出他们的学术著作。

这本书给尤·弗·安德罗波夫以特殊的位置。这首先是由于我在将近 5 年中实际上几乎每天同他有工作上的来往，当时我在他的领导之下在苏共中央的一个部工作。我尽量满足我国社会公众对这位与众不同的、尽管是自相矛盾的政治人物的巨大兴趣。但是，我没有塑造他的政治肖像的任务，因为他长期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活动，有关情况至今依然对我们保密。

这本书不仅写赫鲁晓夫及其战友们，还写到了二十大时期的一代人，描述他们的奋斗、怀疑、矛盾，他们的政治素养。这些都是当前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前所进行的改革是怎样饱经痛苦以后才得到的，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改革可能带来什么。

我甚至要这样说：我对谋士们的思考多于对领袖们。我想描写非斯大林化进程在后来被称作二十大的儿女们的心灵中

如何成熟。但愿读者不要埋怨，我在书中写到了自己，写了自己的摸索、思考、创作，写了自己的经历、经受的考验，自己的飞黄腾达和失落。这当然不是因为我的思想和感情有什么独特之处。恰恰相反，是由于我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是相当典型的。

这些年来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回忆录。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写他所看到的和认识的，总体上逐渐形成了一幅五颜六色的赫鲁晓夫时代的真实历史画卷。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尼基季奇发表的东西以其襟怀坦白、公正和朴实无华尤其使我敬仰。我们应当感激他，多亏了他，我们才得到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这样杰出的文献。

我的这本书是一个未曾进入上流“圈子”、而是处在低一层楼的位置上、并因此有可能对领导人持批评态度的目睹者的最好见证之一。

书中引用了我从文献和那个时代的文章中摘录的一些材料，其目的是为目前进行的辩论和探索文明民主社会新模式的参加者、尤其是年青的参加者提供信息，使他们了解，50—60年代的人曾经说什么和想什么，70—80年代初的人忘记了什么。无论我们怎么说，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的东西在当时都已经说了——在赫鲁晓夫的二十大报告中，在A. И. 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在B·格罗斯曼^①那个时期写的长篇小说《生活和命运》中，在许多政治评论家和政治作家发表的文章中。应该知道这一些，使

① 格罗斯曼(1905—1964)苏联俄罗斯作家。——译者

思维不致于原地踏步。换言之，今天的革命者应当依靠昨天的改革者。

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虚构一个情节和一位主人公——一切都以真人真事写成。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用他们自己的名字。只在某些情况下我改变了这一规矩，为的是不使任何一个人感到委屈。我尽力做到绝对坦率和公正，其中包括对待自己。我并且希望，我的这本不仅仅描述事件的书的这一特点会受到读者的赞许。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解冻	(1)
第二章 安德罗波夫	(42)
第三章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	(61)
第四章 二十大	(91)
第五章 铁托和卡达尔	(115)
第六章 霍查,再谈铁托	(141)
第七章 改革者	(178)
第八章 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226)
第九章 加勒比海危机	(257)
第十章 谋士们	(278)
第十一章 勃列日涅夫	(306)
第十二章 后期的斗争	(347)
结束语	(429)

第一章

解 冻

(一)

我要象我所喜爱的法国小说家那样，首先从自己谈起。这不仅仅是为了给作者画像，而是为了使读者对谋士的形象更加明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并非始于1956年的党的二十大期间，而是在斯大林死后马上就开始的。斯大林之死彻底震撼了我国每个人的心灵，虽说也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感情。似乎坚不可摧、永垂不朽、流芳百世的某种东西已经消逝。一个人死了，遗体应当交给土地——大概有人头脑中掠过这一人生常有的普通想法。不，在整座建筑物的基座已经塌陷、权力制度已经崩溃之后，现在应该怎样生活？什么等待着我们？国家将走向何方？

我还记得在位于列宁大街的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大理石大厅举行的追悼会。当时我是亚·尼·涅斯梅亚诺夫院长担任主席的编辑出版委员会社会科学部的一名秘书。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他用毫无情感、似乎与整

个世界隔绝的噪音谈到了关于伟大的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杰出的学者的去世。然后他使用了一个立即印入我的脑海的公式：以列宁的忠实学生、斯大林同志的战友 Г. М. 马林科夫为首，保证了对党和国家的不间断的领导。不间断的……看来，在上层也感到国家失去了主要支柱。

我能记住的其他发言者有 H. B. 齐钦，赫鲁晓夫的追随者和亲密朋友 Т. Д. 李森科。齐钦在台上大声痛哭，而实际上大家都在哭。由于受悲哀庄重气氛的感染和对重大变化的某种莫名其妙的预感，我的眼睛也湿了。

还记得，走出会场时我不知是正经还是讥讽地扔给一位偶然同行者一句怪话：“现在只剩下一位活着的经典作家——毛泽东，应该赶快收集他的作品。”我不知道，过了 20 年后我能有机会发表他的生平传记。

斯大林出殡时我恰好在最后审判日广场，我国的许多作家回忆过这个广场。但是我是在发生拥挤和流血之前到达广场的。当时，我们在离最后审判日广场不远的佩恰特尼科夫胡同租了一个房间。在领袖去世的前几个星期，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孩子在助产院受凉感冒，肺部双叶发炎。医院不让我们知道病情，孩子住了一个星期就被撵出医院。我们费了很大周折才使他住进了起义广场附近的菲拉托夫医院。一大清早，我路经最后审判日广场，当然不是去给斯大林送葬，而是为了救救自己的儿子，向医院走去。我赶上了在鱼贯而行的送葬车队盖住所有人行通道（不知根据谁的聪明指示）之前走过广场，随之就发生了拥挤。仅在最后审判日广场就有数十人死亡。

我相信遗传学，相信我们的大部分理智和道德品格被出身注定。当然，环境、历史状况、意外事件影响着每一个人；当然也有机遇，你也能作出自己的选择——职业的或政治的。然而摆脱自己的天性毕竟很困难。譬如说，我曾梦想当一名物理学家，只从事科学研究。我一生中最喜爱写作和耗费大量的纸张，而遗传法则却把我渐渐地、始终不渝地一步一步推向政治谋士的角色。这不单单是命运，这来自父母，还可能来自更远的祖先，连我的性格也全部来自他们。

每当想起自己的家庭，我就特别清楚地感到，它与革命后的我们整个社会多么雷同。我的父母的结合是两种文化、甚至是两个只能在把整个社会土壤耕到最深的大转变环境中组合自己生活的阶层的令人吃惊的共生现象。

我的母亲出生在乌克兰、离基辅不远的的一个农村铁匠家庭。我从未见过外祖父，他在我出生前几年死去。据说，他身强力壮，在村对村的格斗中屡屡获胜，以拳术大师而远近闻名。他性情莽撞、语言尖刻、生性贪权。家中有子女8个，他们坐下就餐时，谁也不敢早于父亲把勺子伸向共用的粥盆。违犯者知道，惩治将是迅速和极其严厉的。母亲多次回忆起她被外祖父用缰绳痛打一顿的情景，原因是母亲为了在第聂伯河游得更轻松，把一件连衫裙充气成球，结果把这件唯一的外衣撕破了。

12岁那一年，她离家前往基辅，来到了“人世间”。先在一富人家当保姆，后因与女主人合不来，开始在一家工厂干活。在这里，她被吸收进社会民主小组，教她识字，使她的阶级感情激化到极点，对富人和有权势者极端痛恨。18岁时，她加入

了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成为与白匪作战的战斗支队的女教员。波兰战争期间，她所在的游击队试图独立作战，结果全部被歼灭，似乎只有母亲一人得救。因为在决定性的短兵相接之前，她因病重被送进基辅伤寒病医院。

她常常对我说起他们被迫撤退(应该说是逃出基辅)的情景：所有伤病员都行动起来了(当时她高烧 40 度以上)，有的拄拐杖，有的互相搀扶，靠两条腿从城里撤出。极度紧张似乎成了她的救星，撤出后她几乎失去知觉，但第二天就感到好多了。几个星期后完全康复，随即来到红军的一支正规部队，在这里她与父亲相遇。这次相遇未必是月老安排的。确切地说，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被摧毁的结果，是国内战争期间司空见惯的到处漂泊的结果。

我的父亲完全是在另一个环境中出生和长大的。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康家庭。我对他父母的详细情况不太了解，因为他不喜欢提起他们，甚至根本不向子女们讲。但是我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只有这个家庭才能使他有可能念完彼得堡的古典中学和在高等音乐学院上二年级。父亲一生喜爱音乐，能很好地弹奏钢琴、小提琴、曼多林琴和其他乐器。我记得，他还为歌剧《奥甫根尼·奥涅金》、《鲍里斯·戈杜诺夫》、《火箭炮筒》配过出色的抒情调。父亲是位出色的男高音，他的辨音力相当出众。

还在大学年代，父亲就开始投身革命，这使他的演员职业化为乌有。父亲一生爱写古诗，记得 1945 年从部队回来的父亲已是满头白发，身患严重肺病，但仍然带回了写满了诗的笔记本。